

天道与政道

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对比研究

高健龙 著

Heavenly Way and Political Wa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British Puritanism in 17th Centu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道与政道

张其成 著

张其成 1952年生于北京，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
理事，中国孔子学会理事。

张其成讲读 张其成讲读

天道与政道

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对比研究

高健龙 著

Heavenly Way and Political Wa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British Puritanism in 17th Centu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道与政道: 17 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对比研究 / 高健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1-4118-2

I. ①天… II. ①高… III. ①儒学—哲学思想—研究—中国—17 世纪
②基督教教派—研究—英国—17 世纪 IV. ①B222.05②B97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9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何光沪

多年来，我辅导了不少博士论文的写作，也评阅过许多博士论文，其中有些还被评为“全国优秀论文”。但是，一眼看到论文标题，就忍不住击节赞赏的，首推此篇！

为什么呢？尤其是，记得那一天我正在医院等待做手术，陪同在旁的健龙刚一提到想写这个主题，我竟然不假思索，马上叫好——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从来就认为：第一，论文的“意义”是第一位的——这篇论文的主题不但宏大、有趣，具有比较思想史、比较政治史等方面的学术意义，而且深邃、现实，具有对于当今中国极其深远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一点我尤为看重；第二，大胆的想象力、宽广的理解力十分宝贵，在中国学术界尤其难得——健龙竟然把三百多年前互不相识的旧大陆东西两端的思想和政治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让我眼前一亮，似见凤毛麟角。

当然，这样思考，不但要有意义，而且要有根据。能看到这种意义，需要相当的见识高度和现实关怀；能看出这种根据，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和思考能力。当时这个选题，就让我对健龙刮目相看——现在哲学专业的很多学生或学者，对世界历史一知半解甚至懵懵懂懂；历史专业的很多学生或学者，对哲学思考浅尝辄止甚至毫无兴趣；以我所见，健龙在这些专业和宗教专业中，这方面堪称凤毛麟角。

具体说来，要看出对中国、对英国、对全世界来说，公元17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决定命运、生死攸关的世纪，要看出当时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世界，竟然有如此众多、如此有趣、如此重要、可以从正

反两方面进行比较的地方，看出这种比较颇具深意，这确如凤毛麟角！

17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是号称“大明”的政治大黑暗——文字狱的发明和对士大夫的摧残，使开国皇帝的阉割《孟子》和屠杀功臣相形见绌；锦衣卫的猖狂和东厂、西厂的残酷，使全国官员和普通百姓因命在旦夕而噤若寒蝉；为“国事天下事”忧心呼号的士君子，可以被权臣宦党迫害至家破人亡；为国事跪求哀告的老大臣，可以被多年不上朝的小皇帝一声令下，血肉模糊地杖毙于大庭广众之前……另一方面，是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和市民兴起，再加上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儒学革新，显露出中国历史真正进步的一线希望。然而，跌宕起伏沧海桑田，经过持续多年震动全国的农民战争，再经过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的外族入侵，大浩劫之后，到了世纪末，这一线希望却淹没在称为“大清”的越来越浑浊的专制政治之中……

17 世纪的英国，一方面，是斯图亚特王朝大肆实行专制——国王亲自论证专制合理，随便征税任意罚款；设立“星室法庭”控制言论，逼迫清教信徒流亡海外；罔顾民意解散国会，依靠少数亲信统治；对内镇压民众起义，对外政策则凭一己偏好……另一方面，同样是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以及市民阶层和所谓“新贵族”兴起，再加上被称为“启蒙思想家”的洛克、弥尔顿等人的崭新政治哲学和新教社会理想，也显露出了英国历史大突破的一线希望。然而，与 17 世纪的中国不同的是，同样的跌宕起伏同样的沧海桑田，经过反反复复震动全国的国内战争，再经过激烈复杂的理性博弈请来外国君主，大复辟之后，到了世纪末，这一线希望不但通过君主立宪而在英国变成了现实，而且通过吸引效法而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大突破！

颇为相近的历史变故（甚至这边有破天荒的皇帝自杀，那边也有破天荒的处死君主），颇为相近的改制思想（甚至这边以古老的儒经传统为依托，那边也以古老的圣经传统为依托），为什么结果大相径庭呢？

这当然值得历史学家们深思，当然值得哲学家们深思。但是，这首先值得所有的中国人深思，因为，我们正生活在 17 世纪造成了其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的延续之中，我们也生活在 17 世纪造成了其主要特征

的国际社会的延续之中。过去的思考决定了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思考决定着将来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尽管此书表达的观点，我并非全都赞成（例如对“天人合一”的评论应该更全面），其中的叙述和论证，也尚有改进的余地（如某些事件和关系的评论），然而我却认为，此书作为对这个历史大转折的一次凤毛麟角的思考，即使只是一鳞半爪的思考（其实它虽不十分全面，却颇为系统），真的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值得参考，因为它至少可以激发国人的思考，激发关心国家前途、关心世界前途的人的思考。

在结束这篇短短的序言之前，我想说一点值得思考的小小联想：说起中国和英国的历史，我有时会想到，不少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争夺皇位时，父子兄弟叔侄之间背信爽约相互残杀屡见不鲜（唐宋明清朝朝皆有）；却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以及西欧中欧）接受基督教之后，这种事情比之前（罗马帝国）大为减少，他们对王位继承规则严格遵守，甚至不惜危害自己的利益！——仅以此书涉及的这一段时期为例，爱德华六世死后，按规则让姐姐玛丽而非妹妹伊丽莎白继位，会对英格兰广大民众和贵族在政治和宗教上大大不利，但他们还是按规则迎接玛丽即位，结果确实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伊丽莎白一世死后，他们又按规则接来了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不惜王朝改姓），结果引来了前面提到的政治上宗教上的压迫，以至于引发了革命；詹姆士的儿子查理一世被作为暴君处死，按中国人的想法，他的后代当然是革命的死敌，但是，不久之后连续被接来担任英国国王的，竟然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女和孙女婿！而且，这并没有改变英国更深刻也更和平的制度变革大趋势。由此我想，遵守规则的精神，也就是“宪政”的精神，行动上而非口头上的“仁义礼智信”，也许是上述历史结果不同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此书的讨论可以推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认真的思考则可以推进历史的进步。

为此，我们都该感谢作者的辛劳！

2014年3月24日凌晨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依据与意义	(1)
一 研究问题的依据	(1)
二 研究问题的意义	(6)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9)
一 研究现状	(9)
二 研究方法	(12)
第三节 关键词的界定	(13)
一 儒家思想	(13)
二 专制主义	(14)
三 天道、政道	(16)
四 清教主义	(16)
第四节 研究路径与创新	(16)
一 研究路径	(16)
二 创新	(17)
第二章 朱明王朝的专制	(18)
第一节 朱明王朝专制的强化	(19)
一 朱明王朝思想文化专制的强化	(19)
二 朱明王朝社会政治专制的强化	(25)
第二节 社会的普遍腐败与危机	(32)
一 专制与腐败	(32)
二 社会危机与全盘崩溃	(34)

第三章 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	(38)
第一节 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39)
一 君权神授论与君父论	(39)
二 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的实践	(46)
第二节 斯图亚特王朝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54)
一 经济的衰退	(55)
二 社会矛盾与危机	(56)
 第四章 17 世纪中国儒家思想对专制主义的回应	(60)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内部变革：具有民主意识的启蒙思潮	(61)
一 启蒙思潮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61)
二 启蒙思潮的哲学基础：自然人性论与自然权利论	(64)
第二节 启蒙思想的价值取向	(70)
一 个体性的张扬	(70)
二 自由平等的追求	(72)
三 “经世致用”的指向	(74)
第三节 全面反省和整体批判两千年来的专制主义	(76)
一 解蔽“君权神授论”“君父论”与论政治社会的起源	(77)
二 “天下本位”论	(81)
三 暴君放伐论	(84)
四 个体意识	(86)
五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90)
第四节 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理想	(91)
一 以“相权”制约“君权”	(92)
二 “学校”议政	(93)
三 地方分权治理	(93)
四 改革官僚体制及选官制度	(95)
五 革除“宦官”与“女御”制度	(96)

第五章 17 世纪英国清教主义对专制主义的回应	(99)
第一节 国教的内部变革:具有民主精神的清教主义的	
出现	(100)
一 清教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100)
二 清教主义的内涵	(104)
三 清教运动	(107)
四 清教主义的神哲学基础	(112)
第二节 清教主义的价值观与政治化	(118)
一 清教主义的价值观	(119)
二 清教主义的政治化	(126)
第三节 清教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	(130)
一 解蔽“君权神授论”“君父论”与论政治社会	
的起源	(132)
二 人民主权论	(136)
三 “人民有权反抗暴政”	(138)
四 天赋人权	(140)
五 论法治	(143)
第四节 限制王权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	(145)
一 共和国方案	(145)
二 君主立宪论	(147)
 第六章 中国 17 世纪的历史结局:“康乾盛世”	(150)
第一节 “盛世”背后,皇权专制制度的高度强化	(151)
一 削弱阁权,设立“南书房”“军机处”、创设	
“密折”制	(151)
二 严抑臣下,打击朋党,君臣关系主奴化	(153)
三 “秘密建储”制、科举制与谏官职权的削弱	(157)
四 刑律繁密、皇帝成为活的法律	(159)
第二节 “盛世”背后,思想文化的极端专制	(163)
一 “大一统”论与“正统”论	(163)
二 皇权宰制神权	(165)

4 天道与政道：17 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对比研究

三 “崇正斥邪”论、禁毁图书、文字狱与严禁 “清议”	(166)
第三节 “盛世”之下,儒家的整体沉默	(170)
一 官方理学的复兴与理学精神的衰亡	(170)
二 儒家的文化考古	(174)
第七章 英国 17 世纪的历史结局:“光荣革命”	(178)
第一节 清教徒革命:推翻王权专制	(178)
一 有据弑君与清教共和国	(179)
二 从共和国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	(187)
第二节 “光荣革命”:近代民主制度的初步确立	(193)
一 “光荣革命”:近代民主制的初步确立	(194)
二 宪政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197)
三 英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202)
第八章 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的“天道”与“政道”	(205)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天道”与“政道”	(212)
一 “天人合一”的同一性与黄宗羲的“盈天地皆心”	(212)
二 “天人合一”思维范式的逻辑推演	(216)
三 “天人合一”思维范式的制度路向:圣王政治	(223)
四 “天人合一”思维范式的社会结构路向:政教合一	(229)
第二节 清教主义的“天道”与“政道”	(231)
一 “神人相分”的非同一性与清教主义的 “良心自由”	(232)
二 “神人相分”思维范式的政治制度路向:民主宪政	(237)
三 “神人相分”思维范式的社会结构路向:政教分离	(244)
第三节 结论	(246)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5)

第一章 导 言

17 世纪，在思想史领域，中国儒家思想与英国清教主义不约而同地对王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限制王权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想。17 世纪社会历史的结局是，清教徒推翻了专制王权并将之驯服在宪政主义的牢笼中，从而步入了近代文明，而儒家则在又一个专制王权的高压下陷入了集体沉默，始终徘徊在中世纪的边缘。17 世纪的历史结局说明了什么？首先说明观念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观念的力量诚然要以物质的力量为依托，但观念本身就拥有改变事物的潜能；观念塑造历史的作用诚然要以一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但只有观念才能激发人起而行动。其次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制度先进的西方开始超越原本先进的东方。我们的问题是：清教主义何以能够克制专制主义而走向近代文明的彼岸，儒家思想何以未能克制专制主义而停留在中世纪的此岸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回答。本书从宗教哲学的层面，从“天人之际”终极关怀的角度探究答案的终极依据，即从它们的思想体系的政治理论层面进入最深处的哲学信仰层面，探查它们的逻辑源头与逻辑路向。同时，在对比研究的参照与映衬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如何校正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其路向如何能指向民主宪政，从而实现其现代化转变。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依据与意义

一 研究问题的依据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17 世纪是人类历史自轴心时代以来最关键的世纪。首先，在 17 世纪，人类历史从黑暗的中世纪跃进到了近代文明，

人类从传统社会走进了现代社会，因此它是传统与现代的分野。^① 有学者认为，肇始于 16 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是现代历史的起点。这是就人类思想观念对于传统主义的突破而言的。而就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样态、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整体性的活生生的现代性转变而言，17 世纪才是现代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开端。美国学者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N. Stromberg）指出：“17 世纪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的黎明。”^② 17 世纪奠定了现代性基础，其后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此基础在根本上没有改变。其次，17 世纪亦是世界民主化的开端。17 世纪的现代性突破直接导源于英国革命，英国革命成为其后一系列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原点。它所倡导的自由精神鼓舞着世界人民，它所树立的政治理念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开展，成为世界民主革命实践的指导，它所确立的民主的制度形态给予各国人民以巨大的示范作用。在英国革命的带动下，法国革命、美洲革命，以至于亚洲土耳其的民主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及辛亥革命相继发生，从而使民主化运动遍及整个世界。最后，17 世纪亦是整体化世界历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开端。自 17 世纪始，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已不可能再各行其道，而被纳入了世界总体运行的轨道中，即所谓全球化。有学者认为，1500 年前后，各民族集团之间就有了第一次交往，从那时起各民族集团之间就建立了联系。^③ 这种观点是基于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而言的，因此这种联系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联系，并未对彼此的历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自 17 世纪始，民主化运动的世界化，使得各民族人民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深刻影响了自身历史的运行轨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落后国家和地区成为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原料的供应地。全球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这架大机器的运转中来，全球被交织成了一个贸易的

① 在西方的语境中，并没有“近代”一词，我们对于世界历史分期所使用的“近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在西方的历史理论中就是“现代”这一概念的内涵。

② [美] 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网络，一个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价值观念相互冲撞又相互吸收的网络，一个利益相互争夺又相互依存的网络。

具体而论，17世纪对于英国和中国来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展现了类似的历史背景。第一，17世纪英国和中国的经济基础都产生了重大变革。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的继续，农业生产已经基本市场化，农业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之一环。无地的农民成为雇工，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很少。工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纺织业、煤铁业、矿业以及商业贸易都位居欧洲前列。这种发展势头在王室的盘剥下曾一度被遏制。光荣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猛发展，“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的阶级构成，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他们的思想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清教主义，他们事实上是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的阶级力量。在中国，明代中后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②从而打破了小农经济一统的经济格局。冯天瑜、谢贵安指出：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南北两京、运河沿线等地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局面，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又是以众多的专业市镇为其辅翼的。专业市镇中又以江南最为密集和发达，这种状况与西欧国家的“原初工业化”的兴盛相比并不逊色。^③新型市镇的出现使得过剩的农业人口转向手工业和商业，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同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构成。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被一些先进的儒家士人的思想所代表。萧蓬父、许苏民指出：“明代中叶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迅速地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造成了传统学术的蜕变与挣脱囚缚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④

第二，17世纪对于英国和中国而言，都是王权专制主义横行的世

① [英] 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② 关于这一点，详见许涤新、吴成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④ 萧蓬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纪。历史学家基佐指出：“正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的君权摆脱了古时的束缚，到处都在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无论在哪一国，宫廷的铺张浪费，政务的迅速处理，以及战争范围日益广阔，发生更见频繁，无不表示君权高过一切。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驯服的格言到处盛行。纵使在对此不承认的地区，也只发生很轻微的反抗。一言以蔽之，文化、文学和美术的进步，国内和平和繁荣的增进，都粉饰了纯粹专制制度的胜利，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自信，而使老百姓表现出带有钦佩心情的服从。”^① 基佐所说的虽然主要是欧洲大陆诸国，但用以描述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与复辟时期）也非常贴切（详见后文）。在中国，皇权专制时期可以分作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两个时期虽然分属不同的朝代，但专制主义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越来越强化。后文有详述，此处不多言，仅以一例为证。明朝废宰相设内阁，而清朝干脆将内阁也废掉，皇权从此不受任何牵制。

第三，17 世纪对于英国和中国而言，是一个精神解放、思想启蒙的世纪。在英国，国教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天主教的诸多成分，尤其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而教权又与王权相联合而成为王权的精神护符，共同压制民众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在教权专制与王权专制的双重压制下，迸发出了寻求“良心自由”的清教主义。“良心自由”就是精神自由，即以“良心”见证自我与上帝而不需要任何权威的干涉，寻求“良心自由”就是寻求精神自由。寻求精神自由必然要走向寻求政治自由，否则精神自由将无法保障。这样，神学观念转变成了世俗化的政治思想，并在洛克、弥尔顿等人那里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开启了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皇权专制走到了极致，作为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日益僵化，此二者互为表里摧残人的个性，窒息人的思想。物极必反，儒家思想内部出现了变革，出现了对理学的反动。无论是王艮、罗汝芳的“百姓日用即道”还是李贽的“童心说”都激扬成一种“无之非是”的“率性”精神。精神解放的思潮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那里，因历史的巨大震荡，而发展成为政治批判的思潮。他们的政治思想具有

^① [法] F. 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8—19 页。

早期启蒙的意义。

冯天瑜说：“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14—17 世纪），也即严复说的西方‘古学’转向‘新学’的阶段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较为相当。”^①顺着他的说法，本书进一步认为，如果要在英国思想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而言，都以英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17 世纪），也即英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阶段较为相当。

本书选择 17 世纪的清教主义与 17 世纪的儒家思想相互参照进行研究，首先基于它们有大致相似的历史背景，此其一。其二，如果说清教神学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这大概还有异议。但如果说清教的政治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这是毋庸置疑的，毫不夸张地说，清教的思想与精神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黄宗羲等人的儒家思想调动了传统政治思想中一切积极因素，并将它们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清教主义与儒家思想是各自文明自我发展中最杰出、最光彩夺目的积极成果。它们二者都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批判意识和塑造历史的冲动，都具有政治启蒙的意义。就此面向而言，且不论儒学是否是宗教，都可以消解宗教性的清教主义与世俗化的儒家思想能否相提并论的疑问。其三，清教主义对王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限制王权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最终在 17 世纪末得以实现，托尼（R. H. Tawney）指出，清教用自己的影响来削弱封建残余因素，用直接的进攻推翻专制国家，通过这种方法，清教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它为商业文明准备了道路，这种文明最后在英国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奠定了现代意义的英格兰。^②同时，儒家思想也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整体批判，并提出了限制王权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想，但儒家的

^① 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2 页。

^② 参见〔英〕R. H.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同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9 页。

理想却未能实现，专制王权仍然横行无阻。二者对一个共同的主题，有着两种形式上相似的回应，却有着两样的结局，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探索和深究。其四，17 世纪前，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是两条各自发展的平行线。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使两条平行线不再平行了，它们必然要交于一点。当它们相交在 19 世纪时，中国的厄运就降临了，当我们受尽屈辱，沉痛反思为何有此一劫时，就必然要追溯到 17 世纪和 17 世纪的清教主义与儒家思想。这一段历史姻缘，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历史就是未来，它提醒我们，探究历史就是探究未来。其五，之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对照研究，是因为在彼此互为镜像的呈现中，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看清他者，对于他者清楚的了解就是对于自己透彻的认识，从而为自己如何学习和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而找到一个恰切的入手处。其六，本书是基于历史史实，从“天人之际”终极关怀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对照研究的。“天人之际”的终极关怀是二者所共有的，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它们各自的逻辑路向、政治和社会思想。“天人之际”的终极关怀在儒家思想与清教主义那里，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都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深究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思考历史，诚然是一孔之见，但有利于思考的深刻。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的世界，多元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间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文化间批判地学习。如果忽略后者，多元主义将滑落为相对主义和虚假的和谐，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不但要同情地理解而且要批判地学习。既要敢于批判他者，更要勇于批判自身，重要的是学习和借鉴。这一点，西方学者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而我们一些学者要么沉湎于虚假的和谐中，要么幼稚而狂妄地宣称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儒家文明。这都不利于自身的文化建设，尚处于弱势地位的儒家文明健康的道路是学习和吸收一切异质文明的优秀成果，会通以求超胜。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辉煌的未来。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指向。

二 研究问题的意义

17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该世纪末英国率先改变了社会制度，向着现代社会快速地转变，随后西方世界诸国接踵而至。而东方世界虽有现代性思想的萌动，但整体仍然处于传统社会中。东西方世界这